

—
刘瑜
张铁志
推荐

崔卫平 著

生活在真实中

多年来我无法接受

我在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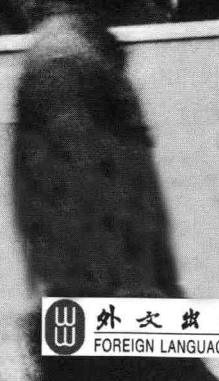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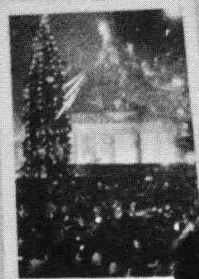
我觉得我应该在别的地方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崔卫平 著

生活在真实中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活在真实中 / 崔卫平著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 2013

ISBN 978-7-119-04583-2

I . ①生… II . ①崔… III . ①文学评论—文集

IV . ① 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7351 号

责任编辑: 曾惠杰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印刷监制: 徐冬梅

书名: 生活在真实中

作者: 崔卫平 著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网址: <http://www.flp.com.cn> 电子邮箱: flp@cipg.org.cn

电话: 008610-68320579 (总编室) 008610-68996183 (投稿电话)

印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75 字数: 192 千字

版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119-04583-2

定价: 36.80 元

如发现印装问题, 可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037



铁葫芦

| 阅读开始了

《二十位人性见证者》 阮义忠 著

作者阮义忠以亲切活泼的笔调及丰富的摄影作品，介绍了桑德、布列松、卡帕等二十位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杰出摄影家的生平经历与影像风格。他们记录人生百态，揭露最真实的人性，作品都打上了强烈的个性化的印记，表达出摄影家的观念、情感以及他们观察和触摸外部世界的方式，他们是 20 世纪的“人性见证者”。

《出梁庄记》 梁鸿 著

历时 2 年，走访 10 余个省市、340 余人，以近 200 万字的图文资料，整理撰写的非虚构作品。他们是中国特色农民，长期远离土地，长期寄居城市，他们对故乡已经陌生，对城市未曾熟悉。他们是中国近 2.5 亿农民工大军的镜子。梁庄与梁庄人的迁徙与命运，中国的细节与经验。看梁庄人走出去的路，看中国农民走出去的过程，看见“看不见”的中国。

《上课记 2》 王小妮 著

2012 年末，王小妮辞去教职，离开讲台。这本书是她 2011 和 2012 两年的“教后感”结集，也是《上课记》唯一的续集。《上课记 2》比《上课记》更为成熟，她对教师身份和学生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更为冷静和内敛，惊讶渐少而悲悯之情愈多。

《工厂女孩》 丁燕 著

在东莞，数百万从乡村奔赴城市的年轻女孩，固定在工厂流水线旁，日夜重复机械的劳动。2011 年，作者丁燕化装为女工，亲身经历了最真实、最深刻的工厂生活，详细记录留下了一个工厂女孩青春、爱情与梦想的蒙昧与破灭的故事，也是对裹挟了无数人命运的现代工业化模式的追问。

《呼唤洁净的世界》 费勇 主编

陈坤发起的“行走的力量”活动书系第二部。我们慢慢地长大，在一次次跌倒中成长，也在成长中犯错，犯错中惊醒！别对自己失望，我们原本就应该是这样自然地生长。也别高估自己，别催促自己，我们总会在这样成长中的某一天觉醒！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tiehulu>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tiehulu>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外馆东街 23 号院，100011



铁葫芦

铁肩担道义 葫芦藏好书

目 录

● 被禁锢的头脑

- 米沃什：一出道德剧的罪人 /2
- 米沃什：黑格尔式的蜚伤 /15
- 赫伯特：站在现实和虚构之间 /32
- 海子神话 /48
- 郭路生 /64
- 文明的女儿
——陆忆敏的诗歌 /74

● 孤独的狂欢

- 狂欢、诅咒、再生
——关于《黄金时代》的文体 /92
- 西蒙娜·德·波伏娃：双刃的言辞之剑 /113
-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沉默和言语之间 /124
- 托马斯·曼的愤怒 /134
- 以赛亚·伯林：承担做不同的犹太人 /139
- 谁是亚当·米奇尼克 /153

● 无权者的权力：哈维尔小辑

分享哈维尔，分享共同的底线 /184

围绕布罗茨基和哈维尔的一场争论 /213

潜在的危机和希望 /229

政治家应该担负更多的责任 /243

人在做，天在看

——读哈维尔的《狱中书简》 /248

● 被压抑的良知：阿伦特小辑

汉娜·阿伦特：亚里士多德绝望的女儿 /272

为阿伦特一辩 /286

新的开端

——阿伦特的行动理论及其“回声” /297

被禁锢的头脑

米沃什：一出道德剧的罪人

“我每分钟一摸就在肉里感到创痛，我抑制着它，并不求上帝转移它，因为他为什么应当把它从我身上移开，如果他不让它从别人身上移开的话？”

——米沃什，1977

米沃什的出身背景，在某些方面和那位俄裔英国人以赛亚·伯林有些相似，他们的年龄也只相差几岁。同为豪门贵族，与当地普通人有着相当的距离；同样不十分在意自己祖先的传统，而是向往方兴未艾的国际社会、国际文化——伯林的父亲是一位被同化了的犹太商人，对于犹太经典一窍不通；米沃什出生后最初几年是在俄国度过的，他父亲在那里以一名机械工程师的身份为生。除了这些清晰的方面，两人背景中那些晦涩的方面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伯

林的家庭里都是说德语的俄国人，而米沃什的家人则是说波兰语的立陶宛人，这种情况多少像一面墙壁被刷了两次油漆。因为民族因素带来的不公正，在两位少年的心里，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如果有一本关于流亡作家的书，其中将伯林和米沃什列在一道，那是不足为怪的。事实上，同样走上了流亡之路的人们，其道路千差万别。少年时代的伯林颠沛流离，尝尽人间辛酸，但很快安定了下来，1921年，他随家人到了英国，接着读牛津、当外交官、著书立说，进入上层社会，可谓风光一时。而米沃什则在年轮所赋予的玫瑰色梦幻中多滞留了一些时光，因而他要为此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伯林曾经用一句话形容自己——“我总是生活在表层”，那么米沃什完全可以担当相反的那句话——“我总是生活在里层”，尽管从个人气质上来说，他们同属于“低调处世者”。

日常生活中总是有超出历史家书写之外的那些成分。米沃什后来描写他在那里完成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的维尔诺，是一个“从童话中长出来的城市”。深藏在林木葱郁的山谷中，远处是众多的森林、湖泊、溪流，耸向天空的众多的教堂塔尖之间遥相呼应，它们金黄的颜色与四周的松树白中带黑的色调形成鲜明对比。当然，城市的郊外还有许多美妙的地方，尤其是不同季节的湖面，成了米沃什和他的诗歌朋友们经常光顾的场所。这些给自己的杂志和团体命名为“灾祸派”的年轻人，并不像是以一种可怕的直觉预言了即将到来的可怕的巨大灾祸；他们更像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迷恋者、追随者，一心想写出骇人听闻的句子，受到世人承认和瞩目。不应忽视的是，受现代主义迷惑本身是有条件的，即感到了与环境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对这些维尔诺上层青年来说，则是与仍处于挣扎

之中的种种传统习俗、观念之间的冲突。

这位法律系学生不务正业的投入和付出得到了回报。1931年，他开始在报纸杂志上正式发表诗作，1933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1934年，大学毕业之后，他拿了奖学金赴法国留学，1936年，回国任职于波兰电台文学部，同年出版第二部诗集《三个冬天》，一个不错的前程似乎正在这个年轻人面前审慎地展开。然而，很快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及澳大利亚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实际上，稍早几天，8月23日德国和苏联就签订了秘密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条约中两国就瓜分波兰达成了协议。立陶宛被算到苏联统治辖区内。苏联红军立即开到了维尔诺。而当德国单方面向波兰下手之后，9月17日，苏联从东部入侵波兰，至10月中旬，波兰军队已经没有还手的余地。1940年，米沃什短期回了一趟维尔诺，他发现苏军统治下的维尔诺已经面目全非，他只有匆匆逃离。他后来形容自己在维尔诺苦苦经营的那个先锋诗歌小圈子，“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

离开维尔诺后，米沃什通过了四道封锁线，艰难地回到华沙，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由于他原先的左派背景，在整个抵抗运动期间，米沃什和左派分子的抵抗运动组织在一起，他编辑了一本抵抗诗文集《不可征服的歌》，并自己写一些带有左派倾向的抵抗诗篇。但与此同时，波兰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抵抗组织，是由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所指挥的“国家军”。这个1939年波兰被入侵不久之后先是流亡巴黎然后流亡英国的旧政府，在相当部分波兰人当中很有号召力。对很多人来说，所谓忠诚于国家，便是忠诚于这个流亡政府。

1944年夏天，当苏联红军把希特勒的部队赶出境内，来到易北河对岸时，这个流亡政府有些沉不住气了。他们希望在华沙城内迎接苏联人的是一个已经有效运作的波兰政府，因此在这之前，应当从德国人手中夺回华沙。1944年8月1日，集聚了好几年的这支抵抗力量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发动起义，但很快遭到德军的镇压。希特勒很快从别处调来了军队，决意夷平华沙，杀一儆百。一部叫作《华沙起义》的纪录片，拍摄者为当时起义队伍中的战士（几乎未能幸存），其中有清晰拍摄到的隶属苏联红军的华沙某部队在易北河对岸河边洗澡的镜头。但是苏联人却没有伸出援手来帮助波兰人。因为他们深知现在正在抵抗德军的这支部队的这些人，是他们进城之后最不易对付的。在《被禁锢的头脑》一书中，米沃什将此比喻为“一只苍蝇面对两个巨人的搏斗”。其结果只能是，一只苍蝇不能反抗两个巨人，只有先后两次被不同的巨人所吞噬。整整六十三天，华沙城火光冲天，死者达二十万，而德军损失不到两千人。眼前悲惨的情景使得人们不得不再次仰天哀告：“到底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忠诚？”不久之后米沃什和朋友在废墟上行走，他看见一块小木板上用红色（不能确定是血还是油漆）写着：“利欧特纳·兹别斯塞克的受难之路。”他陷入了沉思：谁是利欧特纳·兹别斯塞克？在仍然活着的人们中间，有谁知道他最后所受的罪？“从一个被毁灭的大地抛向天空的一声叫喊……”由民族分裂带来人的内心的分裂，精神上的分裂，更是灾难深重和无法衡量的。记住米沃什的这句话：“如果说那些发展得较为和谐的国家里的人们觉得波兰文学难以理解，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国家的分裂。”

米沃什不在起义现场。但是这场起义同样把他变成了一个幸存

者。在这之前，他已经有好朋友不断地死去，在战场上、在牢房里。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一个幸存者的位置上，就是处于一个被拷打的位置上。别人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在周围的亡灵余温尚存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无谓的问题。当死神将人们当中的一部分带走的时候，也给其余人留下了巨大的空白——死者为什么而死？而活者凭什么活下去？显然，幸存者并不直接等于正义的主持人，那么留给他的责任是什么？是否要见证那些离去的人，他们曾经和你我一样活过？米沃什在战争阶段写的诗，充满了种种疑虑、困惑、垂死者的孤独、与亡灵相处的经验、真实的界限以及灰烬、拯救这样一些主题。某些主题甚至贯穿了他一生的写作。在一首叫作《彼岸》的诗中，诗人先是引用了伊曼纽尔·斯威登堡关于地狱的一段话，其中谈到有些温和的地狱如同大街小巷，如同农人的茅屋。诗的开始设想一个年轻人在抓住窗帘的丝绒这最后一件大地上的物件之后，“滑向地板”，他没有想到所有人经历的，自己终究也逃不掉：“然后，我踩进轮辙，/ 在铺得很差的路上。小木屋，荒野上残缺的分租房屋。/ 用铁丝网围起来种马铃薯的小块土地。/ 他们玩仿佛牌，我闻到仿佛卷心菜，/ 有仿佛伏特加，仿佛污垢，仿佛时间。”这里的“仿佛”（as if），浸透了巨大的悲哀：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之后，这些人们所过的仍然是同原来一样的日常生活，仿佛是玩牌，仿佛闻到卷心菜，仿佛有伏特加，仿佛拥有污垢与时间。他们是一些多么不甘心的人啊。

那首名为《咖啡馆》的非常著名的诗，写于1944年。诗中出现的_{时间}是冬天的下午，那是起义之后的第一个冬天，诗人在咖啡馆桌子面前想起了它。“只有我劫后余生，/ 活过咖啡馆里那张桌子，

/ 那儿，冬天中午，一院子的霜闪耀在窗玻璃上。/ 我可以走进那儿，假如我愿意，/ 而在凄冷的空中敲着我的手指，/ 召集幽灵。”在一个布满屈死的亡灵的城市里，传统上被认为是“通灵者”的诗人，成了亡灵的搜集者。他为发现自己与亡灵之间巨大的不对称感到心烦意乱：“……我可能仍在遥远北方的森林中砍树，/ 我可能在讲台上说话或拍电影，/ 使用他们闻所未闻的技术。/ 我可能学尝海岛水果的味道，/ 或者穿着这世纪后半叶的盛装照相。/ 但是他们永远像某些巨大百科全书中，/ 穿着礼服大衣和胸前有花边皱褶花纹的半身像。”诗的结尾，在一种反讽的情景中，亡灵们终于扳回了局面，“转败为胜”。因为他们拥有一个为别人所不了解的知识——如何死于同类的手中：“有时当晚霞漆染贫穷街上的屋顶，/ 而我凝视着天空，我在白云中看见 / 一张桌子晃动。侍者带着盘子急转，/ 而他们望着我，爆出笑声，/ 因为我仍然不知道在手中死去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知道，他们知道得很呢。”（杜国清译）顺便说一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战争诗之所以很少流传下来，原因之一在于缺乏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死者，在把牺牲者提升为“英雄”、“烈士”之后，他们也就没有了人类生命的体温，不存在作为普通人对于生命的热切渴望。

生与死把天空切割成不同的部分，一半是光明、一半是黑暗；也把大地分裂成不同的部分，一半是实体、一半是阴影。站在生与死的界限上，诗人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交给这个世界，而另一部分交给隐匿在世界背后的那些动向、那些影子、那些脚步，认为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具有与这个世界同等的价值，倾听它们在风中摇响或沉默。读米沃什的诗歌，就像看一出黑白的无声影片，一方面有

着关于事物的有力轮廓，鲜明而生动，就像我们上面所举的两首诗，其中的场景栩栩如生；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物体的声音仿佛被一头不知名的怪物吞吃掉了，它们都处于某种湮没无闻的状态，嘴巴上仿佛被贴上了封条。这也许成为阅读米沃什诗歌的一个障碍，因为仿佛有一股来自地心的引力，要把这些句子带到地面之下，而不是放在嘴里甜甜地咀嚼，或者像翎毛插在头上加以炫耀。“岛屿是沉睡的动物，/ 在湖的巢穴里，/ 它们躺下来，呜呜直叫；/ 它们头上是一片乌云。”（《最后的声音》，绿原译，下同）“在白色正午在残砖断壁中间，让蛇 / 在款冬的叶子上取暖吧，让它沉默地围着无用的金器转着发光的圆圈吧。/ 我不想回去。我要知道在拒绝了 / 青春和春天之后，在拒绝了 / 那些在狂热的夜晚 / 情欲从中流出的红唇之后 / 还有什么剩下来。”（《别了》）越到后来，这种带有波兰文化中特有的阴郁氛围的场景，越来越具有一种危机四伏的性质，仿佛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一点什么，某种临时的平衡就要打破：“睡眠：岩石和海角将躺在你体内。/ 荒芜的地带有不动的动物军事会议，/ 爬虫的大会堂，泡沫四溅的白茫茫一片。睡在你的上衣上吧，你的马在啃草 / 一只苍鹰在测量一座悬崖。”（《这是冬天》）

你会发现，所有这些景象都通向一条草木不生的绝路。如果说一个诗人要有所承担的话，那么承担死者给人们留下的巨大的空白，承担巨大的灾难之后精神上的空虚绝望，则是那些高唱“道义、良知”者永远不会明白的。高调论者们口口声声谈论“诚实”，但恰恰将对自身的诚实排除在外，有关自身的黑暗和软弱并不出现在他们的词典当中。他们的“良知”是用来检查别人内心的，是别人良心的检察官，而并不是用来感知自身，并通过感知自身的疼痛和尴

尬，从而能够感受和体验他人。“但我身上除了恐惧一无所有 / 除了黑浪一无所有 / 我是刮在黑暗中又消失了的， / 我是去了不再回来的风， / 是世界的黑草地上马利筋的花粉。”（《她》）“我们是一个掠过一长串屋子的回音。”（《茵陈星》）“没有影子的东西，没有力量活下去。”（《信念》）一再触及那些不发出声响的事物，去推开无人问津的柴扉，米沃什走的是一条寂寞的羊肠小道。

但这只是米沃什所遭之罪的上半阙。他真正的苦难还在后头。

必须把米沃什 1951 年的离任出走和比如昆德拉以及苏联诗人布罗茨基区别开来。后两者都是因为作品在国内惹了祸，遭到禁止，基本生活都遇到了困难。布罗茨基因为写诗，甚至以“寄生虫罪”被判劳教三年。结果最后一次迈出牢房的大门，便被塞进一架其本人方向不明的飞机，目的地是巴黎，从此流落西方。米沃什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的作品和他本人都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并且他身为国家官员而非平民。当时关于斯大林以及苏联集中营的罪行还没有被揭露，战后由全民投票和立法议会选举的“人民波兰”刚刚诞生不久。

需要引进另外一个维度作为参照。1933 年希特勒上台时，1929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托曼斯·曼恰好旅居瑞士。对于从祖国传来的消息，他越来越感到怒不可遏。纳粹宣传机器中宣称的所谓“新的德国”，所谓“民族革命”，对于这位自认为是从路德和歌德传统中生长出来、无限热爱德国传统文化的作家来说，是无比粗野的公然挑衅。而且许多知识分子居然都跟着起哄，托马斯·曼称他们在报纸上的作为是“精神杂耍”。不久前成立的“帝国作家联盟”要求托马斯·曼公开效忠在“国家权威”精神下的文学。他

的一位老朋友恩斯特·伯特兰姆最终把托马斯·曼惹恼了，是因为他竟然把席勒说成“一个陶立克式德国 - 腓特烈男人”，这使得托马斯·曼断绝了与他的来往。1933年到1936年，这期间离战争、集中营、大屠杀还有好几个年头，这位德国大文豪、贵族礼仪的典范，被称为“最孤芳自赏的欧洲精英的王冠上的钻石”，在私人书信中，用了全部“酒吧斗殴式语言”：“白痴”、“流氓”、“令人厌恶的小丑”、“悲惨的可怜人”、“邪恶的闹剧”、“奴隶的劣根性”、“精神上的阉割”，等等。1946年才出生的波兰年轻历史学家米奇尼克1986年在雅鲁泽尔斯基当局的狱中，阅读了这批后来才被发表的信件，苦苦思索这位文明的杰出代表，为什么“在言辞上失去了控制”？米奇尼克的结论是——因为所有这些做法背后的“野蛮和荒芜”。“多么不可思议的粗野！”对于人类文明的侵犯，把人的头脑削弱成宣传机器的一个容器的做法，没有比这更加粗野的了。

如果不能深入一个作家对于精神自由、创作自由的要求，单单从一般的道德立场甚至国家的立场来说，米沃什的做法迄今仍然有极大的争议。相反，在一些完全不存在争议的地方，也很可能存在某种误区。逃离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有什么过错？这样的辩护其实同样太意识形态了。许多事情、行为表面上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所持理据不一样，实际上就不能混为一谈。对于诗人米沃什来说，他直接面对的可能不是制度、国家、民族身份等，他感到关系最密切的是，头脑和想象力如何自由地展开、他自己的写作如何延续，以及如何保证自己新的作品在一定的水准之内。不难想象，从那样一个先锋写作的圈子出来，他太知道什么是写作的尺度。

然后你就来理解他的这样一些行为：不幸流落巴黎街头之后，